

明蜀僖王墓出土青花瓷器的年代与用途辨析

——兼论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创烧背景

吉笃学¹ 吉璇朗²

(1. 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深圳市 518002; 2. 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市 530007)

关键词: 明蜀僖王墓; 宣德; 万历; 空白期; 民窑

摘要: 现有研究认为明蜀僖王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碗是明代已知最早的民窑青花瓷器, 但仔细研究发现, 这件碗的年代实际应为明代万历早期, 它并非蜀僖王墓的随葬品, 极可能是盗墓者使用的油灯。并且, 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的生产始于明代宣德时期, 在明代“空白期”并未停滞, 反而进入爆发式的发展阶段。因此, 明代瓷器生产“空白期”的概念仅适用于御窑, 而非民窑。

Keywords: the tomb of Prince Xi of Shu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Xuande Era; the Wanli Era; interregnum; folk kilns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 posits that the blue-and-white bowl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Prince Xi of Shu of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folk-kiln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of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a detailed re-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the bowl actually dates to the early Wanli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Not a funerary object buried in the tomb of Prince Xi of Shu, it was most likely an oil lamp used by tomb robbers. Furthermore, the production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by folk kilns at Jingdezhen commenced during the Xuande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out the so-called “interregnum in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it experienced explosive growth rather than stagnation.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an “interregnum in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pplies exclusively to imperial kilns, not to folk kilns.

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器创烧的时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1976年, 张浦生根据20世纪60年代南京玉带河出土器物提出明洪武时期景德镇民窑已生产青花瓷器的观点^[1]。2011年, 颜劲松在成都下东大街遗址的发掘简报中指出原来认为的洪武、永乐和宣德三朝的民窑青花瓷器实际与明代“空白期”产品比较相似^[2]。后来, 随着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资料的陆续公布, 陆明华认为过去所谓的洪武到宣德的民窑青花瓷器, 从不认识到认识, 又从认识到怀疑, 转而从肯定到否定, 我们似乎离真相越来越远^[3]。

然而, 2017年陈冲基于对沉船出水民窑青花瓷器的系统整理, 指出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烧造年代最早不过明代宣德时期^[4]。2020年, 秦大树等根据景德镇落马桥明清遗

存的发掘成果, 认为“正统之前的宣德后期, 景德镇民窑已经开始了少量的青花瓷器生产”^[5], “青花取代白瓷走向规模化生产应从宣德以后的‘空白期’开始”^[6]。2022年, 陈洁也注意到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器在宣德之前存在明显的断层^[7]。

综上所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 学界关于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创烧年代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目前, 成都明蜀僖王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最早例证, 它对于研究与认识民窑青花瓷器的产生时间、烧造地点及技术传承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重新检视明蜀僖王墓出土的青花瓷碗年代的基础上, 对其用途展开分析, 最后就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的创烧背景进行探讨。

一、明蜀僖王墓出土青花瓷碗的年代

明蜀僖王墓^[8]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大梁村的大梁山南麓，西距市中心约14.5千米。1979年10月，成都市文物管理处考古组（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蜀僖王墓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出土墓志记载，该墓的墓主人为朱友壘，明宣德七年（1432年）晋封为蜀王。宣德九年（1434年），其因风疾发作而终，明宣宗赐谥“僖”，次年，被葬于成都府华阳县积善乡正觉山之原。

蜀僖王墓在后世惨遭洗劫，考古发掘时“仅残存500余件器物，种类有陶瓷器、铜器、铁器等，其中陶俑400余件。随葬品分布于不同的室内，如将军俑位于前庭厢房和正殿大门口，其他陶俑和陶马、乐器位于正庭的左右厢房前面，箱、案、桌、凳分立于中庭，盘、碗、瓶等则被放在中庭两侧的次间厢房内”。该墓正庭出土了一件青花瓷碗（B：220），白胎，侈口，弧腹，平底，矮圈足，器表及碗心饰青花折枝莲花纹，外底有“西平佳器”款，口径12.3、高5.6厘米。（图一）

关于蜀僖王朱友壘的生卒及下葬时间，《大明蜀僖王圹志》《明史》和《华明县志》等均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在考古学上蜀僖王墓是一座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依据考古遗迹出土器物之间的共存关系，一般认为墓葬与墓内随葬品的年代基本相当。然而，受后世盗掘活动或其他原因的影响，墓中原有器物之间的共存关系无疑会遭到扰乱或破坏。在通常情况下，盗墓者在盗掘过程中会将盗墓工具或多或少地遗留于墓

室之中。同时，他们也会随意移动、破坏或拿走部分或全部随葬品，这就造成了随葬器物在墓中的位置与组合发生明显的改变。因此，即便现在看来是一座纪年明确的墓葬，如果后期明确受到扰动，我们也需要对其出土物进行客观地分析与研究，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

鉴于明蜀僖王墓已遭盗扰，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比分析同类器年代的方法对该墓出土的青花瓷碗的年代进行探讨。

1. “癸酉年制”款青花碗底。北京曾出土一件折枝莲纹青花碗，仅残余碗底。碗内底的双圈中绘双枝莲花，花瓣的边缘用双线勾勒，中间留白，花叶并非常见的圆盘形，而是左右分列，十分紧凑。器表腹部残存大部分花纹，主要有成组的折枝卷草纹和双枝莲花纹。下腹和圈足各绘一道弦纹，外底正中自右向左竖向书写“癸酉年制”四字^[9]。（图二，1）根据已有青花瓷器的发展谱系研究成果，这里的“癸酉”对应的年代可能是明万历年元（1573年）。这件器物与蜀僖王青花瓷碗的器形和纹饰均较为相似，不同的是，后者的纹样似乎更加疏朗，莲叶已绘成椭圆形，因而年代可能稍晚一些。

2. “南澳Ⅰ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粉盒。“南澳Ⅰ号”沉船是近年来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日本博多遗址出土的“大



图一 成都明蜀僖王墓出土的青花瓷碗（B：220）

明万历年制”鱼纹碗等证明其确是一艘万历早中期的沉船^[10]，并且极可能沉没于1581~1588年^[11]。

“南澳I号”沉船目前共公布了两件青花折枝双莲纹粉盒。一件为标本2010NAC0042，盖为直口，圆弧形顶，青花浅蓝，盖壁绘缠枝莲纹，盖顶绘双枝莲纹，莲瓣呈青色但边缘留白；盒为子口，尖唇，弧腹，近底内收，浅圈足，绘缠枝莲纹^[12]。（图二，3）另一件盒盖上的莲瓣满涂蓝色无留白^[13]，（图二，2）其他与前者基本相同。这两件带盖粉盒上的折枝双莲纹与蜀僖王墓碗底内心和外腹的纹样几乎完全一样。由此推断，蜀僖王墓出土的这件青花折枝双莲纹碗的年代可能为明万历早期。这一认识与易立将“西平佳器”款瓷器年代判定为明代隆庆至万历

早期（1567~1591年）的观点^[14]较为接近。蜀僖王墓出土的青花瓷碗也与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第二期（1565~1590年）碗（PP116和PP125）^[15]非常相似。此外，这种纹饰也见于明万历时期御马太监周臣墓出土的银渣斗^[16]。

综上所述，虽然蜀僖王墓志等记载该墓修筑于明宣德十年前，但是墓中却出土了与墓葬年代并不相符的万历早期的青花瓷碗，这显然系二次埋入的遗物^[17]，说明后世的盗墓者将当时的器物带进了墓室，从而造成了墓内器物组合的改变。

二、青花瓷碗的用途

一般来说，盗墓讲求轻装和实效，除了盗掘工具，盗墓者还会携带盛水器和灯盏等。

蜀僖王墓中出土的这件青花瓷碗已经残破过半，专门用来饮酒或水可能略觉勉强。同时，我们通过梳理考古资料，发现墓中出土残破碗或碟的情况，不止蜀僖王墓一例。

1. 湖南长沙烂泥冲2号墓的年代为南朝齐永元元年（499年），该墓出土的一件瓷碗已碎成三块，经拼接后仍有两处残缺^[18]。（图三，1）其与扬州三元路邮电大楼工地出土的青釉碗^[19]十分相似，显然是唐代长沙窑的产品。

2. 河南洛阳元祉墓的年代为北魏永安三年（530年），该墓盗洞中发现两件白瓷盘，其中一件（IM4034：1）残剩一半，而另一件（IM4034：61）也仅残存三分之一^[20]。（图三，6、7）二者与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21]出土的多件白瓷盘（IT62ZF7：8、IT65④：28、IT24⑤：216）均非常相似，（图三，2）并且元祉墓白瓷盘（IM4034：61）与宝丰清凉寺白瓷盘（IT10④：77）的内底均有支钉痕。因此，元祉墓白瓷盘的年代可能是宋金时期。



图二 与蜀僖王墓出土青花瓷碗相近的器物

1. 北京出土“癸酉年制”款碗底 2、3. “南澳I号”沉船出水青花折枝双莲纹粉盒（无编号、2010NAC0042）

3. 陕西礼泉郑仁泰墓的年代为唐麟德元年（664年），该墓出土的青瓷碗残存一半^[22]，形制与陕西五代黄堡窑址^[23]的产品非常相像。（图三，3、4）

4. 河北保定满城张弘略墓的年代为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该墓出土的折腰青花盘^[24]（图三，8）与明景泰四年（1453年）严升墓和景泰七年（1456年）袁龙贞墓^[25]出土的釉里红盘（图三，5）的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其应是一件明代“空白期”的产品，但它已碎裂，经拼接后也只残存大半。

以上这些器物基本属于残器，大部分损坏近半，有的残损更多。盗墓者会不会将这些捡拾而来的器物进行二次利用，临时充当灯盏呢？

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宁夏海原菜园林子梁遗址距今4500~4800年前的窑洞LF13的壁上，因插放照明用具而留下来多处楔形小孔和火炬状红烧壁面^[26]，这可能是我国最早利用植物点火为灯的证据。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出土的盂形陶灯是我国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灯具^[27]。我国古代灯具的形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带柄灯。江苏南京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清凉山墓出土的瓷灯^[28]、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年）贾宝墓出土的莲花人物石灯^[29]、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徐显秀墓出土的青釉莲瓣纹灯^[30]及广州出土的东汉胡人俑座陶灯^[31]等都是这类灯具的典型代表。（图四，1、4、5）这类灯盛放油脂的盘较高，照明范



图三 墓中扰入瓷器的年代校对

1. 碗（湖南长沙烂泥冲2号墓） 2、6、7. 白瓷盘（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 I T65④：28，河南洛阳元祉墓 I M4034：1、I M4034：61） 3、4. 青瓷碗（陕西礼泉郑仁泰墓、陕西黄堡窑址） 5. 釉里红盘（江西景德镇镇袁龙贞墓） 8. 青花盘（河北保定张弘略墓）

围更大，往往是宫廷和达官贵族宽敞居室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类是碗形灯，带圈足，与食器碗的形制几乎无异。如浙江临安明堂山唐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32]出土的越窑青瓷油灯，山西大同金大定三十年（1190年，墓志纪年）阎德源墓出土白瓷大碗，“碗内的香油已凝固变成黑色，可能是作为长明灯的”^[33]。第三类为碟形灯，灯盘之下无柄、无座，形制如圈底或矮圈足碗或碟，有的地方称之为盏。如陕西西安唐开元十二年（724年）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陶灯盏^[34]和江西新建区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胡文郁墓出土的青釉灯盏^[35]，（图四，2、3）以及明代广泛使用的黑釉浅腹灯盏。

从形制上看，以蜀僖王墓等为代表的被盗墓葬中发现的碗或碟的形制类似于第二、三类灯具，盗墓者只需将这些残损的器物倾斜放置即可满足盛油点灯照明的基本功能，因此，这些器物被用作灯盏的可能性极大。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河北保定张弘略墓出土的青花盘的圆心有明显的污渍侵蚀或严重磨损痕迹，其是否与当时盛放灯油有关，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三、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创烧背景

以上分析基本确认蜀僖王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碗并非明代早期的民窑青花瓷器。那我国民窑青花瓷器的最早代表还有哪些呢？

1. “明宣德年”款折腹盘。北京城区的建筑工地曾经出土过一件青花盘，直口，浅折腹，外底无釉，中心有乳突，足根向外斜削，内高外低；盘沿内侧有一道弦纹，内底圈中自左而右书写“明宣德年”四字；盘的外腹部绘折枝莲花，中间以疏朗的卷云纹相隔^[36]。（图五，1）已有研究表明，自明代永乐朝开始，压手杯和高足碗等极少量器物始有署“永乐年制”款等本朝年款。到了宣德时期，瓷器上开始大量出现“大明宣德年制”款，并一直沿用到清代晚期。很明显，这里的“明宣德年”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含义相同，之所以采取了较为简化的形式，可能是受到皇家禁令的束缚和限制。

2. “宣德拾年”款青釉钵。2018年，景德镇唐英学社举办的“藩府佳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窑业特展”上曾展出



图四 灯盏

1. 南京三国吴墓 2. 西安金乡县主墓 3. 新建胡文郁墓 4. 大同贾宝墓 5. 太原徐显秀墓

一件“宣德拾年”款青釉钵，该钵在2017年采集于景德禅寺旧址，现藏于景德镇唐英学社。青釉钵为直口，腰部有两道弦纹。褐胎，青釉，釉面有冰裂纹，开片较大，下腹釉面光洁平整，上腹釉面浓稠不匀，局部缩釉明显，可见褐色露胎斑块。上腹浅刻花卉纹，下腹刻划变体莲瓣纹。沿下竖向分两行写“……□吉。大明宣德拾年岁次乙卯年置”。（图五，2）经科学检测，该件器物上的文字系用国产青花料^[37]书写。

以上实物证明，目前我国明代民窑青花瓷器创烧于宣德时期。“明宣德年”款青花盘基本明确了它的朝代，而明“宣德拾年”款钵则进一步说明民窑青花可能兴起于宣德时期的偏晚阶段。因此，宣德十年前后成为我们观察和认识民窑青花瓷器兴起现象的重要时间窗口。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一记载，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崩，英宗初即位后，即下诏“抄造纸劄、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煅炼铜铁、采办梨木板及各处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38]。《浮梁县志·卷八·食货陶政》载：“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元年，委中官烧造。”^[39]清《陶说·卷三·正德窑》亦载：“《豫章大事记》云：‘景泰五年（1454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是既罢督造之官，又减岁造之数也。故宣宗后几二十年，窑事不著。天顺复辟，丁丑仍委中官烧造，

则御器之监造如故矣。”^[40]这三条史料说明，宣德十年随着瓷器的停烧，御窑厂二十多年窑事不振，这就是所谓的“空白期”。然而，御窑厂的瓷器生产并未完全停止。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万七千九百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硃红膳盒等件令行在营缮所造，从之”^[41]。同年十月“丙戌，行在工部奏宫殿新成，奉旨进九龙九凤膳卓等器，臣等奏准，令工部及江西饶州府料造，今屡遣官催理，皆未完，请治其官吏怠慢罪。上曰：姑恕之，仍促使完，不完不宥”^[42]。正统七年（1442年）六月，“（庚子）工部以有司所造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俱不及式，治调官罪，复令改造。上恐劳民，诏勿改造，提调俱宥之”^[43]。由此可见，虽然正统六年重启了御窑厂瓷器的生产，但是，饶州府负责烧造金龙金凤白瓷罐等物件，并未提及青花瓷器的烧造。后来明廷为庆祝永乐年间烧毁的三大殿的重新建成而定烧九龙九凤膳亭等器，御窑厂也迟迟完成不了任务。最后，甚至连品质也无法保证。

1988年，景德镇御窑厂西墙附近的第②层出土大量青龙白地花缸残片，可拼对复原出20多件^[44]。文献记载，正统九年（1444年）五月，“（丁卯）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45]。考古出土遗物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表明御窑厂出土青龙白地花缸极可能是“空白期”的产品^[46]。2014年，御窑厂珠山北麓^[47]发现的所谓“空白期”瓷器与已知的明代成化瓷器相比只是无款，它们的器形和纹饰



图五 民窑青花瓷器

1.“明宣德年”折腹盘（北京出土） 2.“宣德拾年”款钵残片（景德镇唐英学社藏）

等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见,御窑厂真正能确认为“空白期”的产品很少,这表明在政治较为动荡的正统至景泰年间,景德镇御窑厂虽有生产,但各方面均极度衰落,直到天顺元年才略有改观。

然而,与御窑厂烧造几近停滞局面截然相反的是,景德镇民窑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正统元年(1436年),“江西浮梁县民陆子顺进瓷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直”^[48]。而且,正统三年(1438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49]。当时的民窑可能是借助流落到民间的御窑工匠烧制官样青花瓷器,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并引起朝廷的惶恐和不安。正统十二年(1447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50]。这说明此时景德镇民窑的烧造能力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青花白地瓷器,还涉及更为复杂的彩釉瓷。

同时,相当一部分藩王定制瓷器也快速成为景德镇瓷器工业的重要支撑。如江西新建区正统二年(1437年)宁王朱盘斌墓^[51]中出土的青花罐已经非常成熟。同时,民窑瓷器逐渐成为各地藩王墓葬的标配。如湖北武汉正统六年(1441年)梁庄王墓^[52]中出土的褐胎青花梅瓶和正统十二年(1447年)明景陵朱孟炤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龙纹盘^[53]等。另外,江西德兴正统十二年(1447年)张叔崑墓^[54]出土的两瓶一炉三件青花瓷器则是民间使用民窑青花瓷器作为随葬品的最早例证。

综上,明代“空白期”的概念在考古学上只适用于御窑^[55],它并非兼指御窑和

民窑^[56]。景德镇御窑厂几乎停烧,一方面导致御窑瓷器生产出现了二十多年的“空白期”,另一方面却间接刺激了景德镇民窑制瓷手工业的异军突起。

四、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四川成都明蜀僖王墓出土青花瓷碗的年代,认为它实际上是明代万历早期的产品,很可能是盗墓者盗墓时使用的灯盏。目前,“明宣德年”款青花盘和“宣德拾年”款青釉青花钵是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创烧的最早证据,而御窑的几近停烧可能间接刺激了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产业的繁荣。

-
- [1] a. 南京博物院. 南京明故宫出土洪武时期瓷器. 文物, 1976, (8).
b. 南京博物院,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朱明遗萃: 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c. 张浦生, 霍华. 1995年南京明故宫出土文物研究. 东南文化, 1997, (1).
 - [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下东大街遗址明代早期遗存发掘简报. 文物, 2011, (7).
 - [3] 陆明华. 明正统、景泰、天顺景德镇瓷器及相关问题 // 上海博物馆. 灼烁重现: 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集.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9: 9~25.
 - [4] 陈冲. 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 考古与文物, 2017, (2).
 - [5] 秦大树, 高宪平, 翁彦俊. 落马桥窑址明清遗存发掘的收获及相关问题. 文物, 2020, (11).
 - [6] 高宪平, 秦大树, 邹福安.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明代早期遗存发掘收获与初步研究. 考古与文物, 2023, (1).
 - [7] 陈洁. 元末明初景德镇民窑业再思考: 兼论元青花烧造时代下限 //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集刊: 第十三期.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 243~254.
 - [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 文物, 2002, (4). 以下涉及明蜀僖王墓材料皆出自该文, 不再另注。

- [9] 曲永建. 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254.
- [10] 陈冲. 南澳 I 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 华夏考古, 2018, (4).
- [11] 吉笃学. “南澳 I 号”沉船再研究. 华夏考古, 2019, (2).
- [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省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孤帆遗珍: 南澳 I 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280.
- [13] 广东省博物馆. 牵星过洋: 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5: 108.
- [14] 易立. “西平佳器”款青花瓷小考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成都东华门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瓷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325~332.
- [15] 王冠宇. 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出土十六世纪中国瓷器. 考古与文物, 2016, (6).
- [16] 北京考古研究院,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北京海淀明御马太监周臣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23, (9).
- [17] 李春华, 易立. 考古所见的明代蜀藩瓷器面貌及有关问题 // 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方民族考古: 第二十五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311~342.
- [18]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沙烂泥冲齐代砖室墓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12).
- [19] a. 徐忠文, 徐仁雨, 周长源.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66.
b. 马文宽. 勿里洞沉船与长沙窑瓷 // 刘庆柱, 主编. 考古学集刊: 第19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420~433.
- [20]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北魏元祉墓发掘简报 //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考古: 总第18期.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 3~26.
-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宝丰汝窑博物馆. 宝丰清凉寺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157, 162.
- [22] 陕西省博物馆, 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 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72, (7).
- [23] 惠善利. 铜川文物精萃.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2013: 40.
- [24]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 保定市文物管理所, 满城县文物管理所. 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 文物春秋, 2013, (5).
b. 林梅村.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文物, 2018, (12).
- [25] 欧阳世彬, 黄云鹏. 介绍两座明景泰墓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 文物, 1981, (2).
- [2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宁夏菜园: 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25, 26.
- [27] 高蒙河. 灯烛.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10.
- [28] 浙江省博物馆. 青色流年: 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图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43.
- [29]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21, (6).
- [30]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齐徐显秀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55.
- [31]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州市先烈南路汉晋南朝墓葬 //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56.
- [32] 明堂山考古队. 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 //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编.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94~104.
- [33] 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78, (4).
- [3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唐金乡县主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118.
- [35]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272.
- [36] 同[9]: 136.
- [37] 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景德镇陶瓷简史.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23: 112.
- [38] 黄彰健, 校勘. 明实录: 附校勘记: 全183册: 明英宗实录: 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2.
- [39] 乔濂, 修. 贺熙龄, 纂. 浮梁县志: 卷八. 清道光三年刻, 清道光十二年补刻本. 1832: 624.
- [40] 朱琰, 撰. 陶说. 杜斌, 校注.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84.
- [41]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七九. 前揭书: 1557, 1558.
- [42]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八四. 前揭书: 1678, 1679.
- [43]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九三. 前揭书: 1878, 1879.
- [44]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景德镇出土陶瓷. 香港: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1992: 16.
- [45]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一一六. 前揭书: 2344.
- [46]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等. 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陶瓷考古通讯, 2016, (1). 其中C4发现的青龙白地花缸叠压在第⑥层宣德层之下, 尚不排除这类缸也烧造于宣德时期.
- [47] a. 故宫博物院, 编. 明清御窑瓷器: 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 北京: 故宫出版社,

- 2016: 385~389.
- b. 王冠宇, 江建新. 填空补白Ⅱ: 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19.
- c. 上海博物馆. 灼烁重现: 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集. 前揭书: 102~279.
- [48]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二二. 前揭书: 444.
- [49]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四九. 前揭书: 946.
- [50]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一六一. 前揭书: 3132.
- [51] 古湘, 陈柏泉. 介绍几件元、明青花瓷器. 文物, 1973, (12).
- [5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钟祥市博物馆. 梁庄王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彩版七三~七九.
- [53]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 武汉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妻墓发掘简报. 江汉考古, 2010, (2).
- [54] 张柏, 主编.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江西.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84, 185.
- [55] POPE J A.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1: 101-105.
- [56] 高宪平.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瓷器研究综述 // 王冠宇, 江建新. 填空补白Ⅱ: 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 前揭书: 423~437.
- (责任编辑: 刘亚玲)

(上接73页)

- [70] 同[25].
- [71] 同[41] b.
- [72] 陕西省文物勘探有限公司. 富平银沟遗址调查与勘探: 2012~2013.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 图版九四.
- [73] 陈馨. 大英博物馆藏陶瓷枕. 收藏, 2014, (19).
- [74]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洛阳市苗南村两座宋墓发掘简报 // 洛阳考古: 总第8期.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60, 64.
- [75] 刘辉. 宋元时期陶瓷枕的考古学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14, 293, 301.
- [76] 魏女, 王小蒙. 泥火幻彩: 陕西古代瓷器.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180.
- [77] 据介绍, 汉中市出土1件褐黄釉“枕”, 不过其器身中部有一周缝隙, 似为子母口, 再结合通高1.8、长5厘米的尺寸, 本文认为该器物应不属于陶瓷枕, 详见: 汉中市博物馆. 汉中八里桥水库清理一座宋墓. 文博, 1989, (1).
- [78] 脱脱, 等. 宋史: 卷一百七十五: 食货上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251.
- [79] 王开. 陕西航运史.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7: 163.
- [80] 程有为. 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77.
- [81] 河南省交通厅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河南航运史.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157.
- [82] a.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4: 299~456.
- b. 周成. 中国古代交通图典.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5: 10~17.
- [83]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万历野获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660.
- [84] “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 运租庸杂物等脚, 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 山阪处一百二十文. 车载一千斤、九百文. 黄河及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 上水十六文, 下水六文; 余水上十五文, 下五文(每百里百斤)……”详见: 李隆基, 撰. 李林甫, 注. 大唐六典.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1: 72.
- (责任编辑: 王 涵)